

高考陪读：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

范云霞¹ 郑新蓉²

(1. 杭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杭州 311121; 2.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摘要:在教育竞争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不同阶层的家庭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家庭教育参与的相关研究表明中产家庭女性家长以极大心力投入精致教养之中,但是对于劳动家庭教育参与研究还有待深入。以往的研究认为,劳动家庭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对教育参与不足。以“高考陪读”而闻名的M镇为个案,研究发现:劳动家庭以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全身心投入到“服侍”子女的照料型劳作,以此支持子女参与高考竞争。这种教育参与的动力机制是中国“锦标赛式流动”的教育机制的高竞争性现代化进程中以“儿女心”为表征的新家庭主义。劳动家庭以陪读劳作换取子女集中精力与时间投入“苦学”,试图避免子女重复其“苦活”命运。

关键词:教育参与;母职;高考陪读;教育劳动与分工;教育竞争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0)05-0053-09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20.05.007

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加剧了教育竞争。在教育竞争中,家庭或者说家长愈发卷入学校教育过程之中。正如Kay Standing所言,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已经变成一种无报酬的家庭劳动形式。^[1]关于家长教育参与的研究表明,不同阶层母亲在教育参与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发现不同阶层家长有着不同的养育模式,她所提出的工人阶级“自然成长”模式与中产阶级“协作培养”模式被认为是理解不同阶层家长教育参与角色的重要视角。^{[2]31[3]198-199}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家长教育参与的研究展现出中产阶级女性家长在教育参与上养育模式精细化、并通过课外补习投入以增强学生的学业竞争力。^[4-6]在教育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我们还需要关注中国劳动家庭教育参与的特殊方式——“高考陪读”。高考陪读表现为家长迁至高中学校附近租房并照料学生生活起居以支撑学生集中精力和时间于准备高考的学业上。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城镇地区,其参与主体是从事个体工商

户、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与农业劳动,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依赖体力劳动收入的劳动家庭。本文试图关注劳动阶层女性家长的教育参与实践,并以“高考陪读”典型个案——M镇的陪读家长为例分析教育参与的性质与特征。

一、家庭教育参与研究的相关文献

家庭是教育中的重要场域,学界已有大量关于家庭是阻碍还是促进学生教育发展与学业成就的研究。^[7]例如,家庭所处的社会阶层地位,父母的文凭,父母的教育期待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业成就;^[8-10]家庭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对学生教育有着重要作用,处于资本劣势的家庭在教育中同样处于劣势。^[11-12]这些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家庭在学生教育生涯中处于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学生的教育生涯。

(一)家庭(家长)教育参与的内涵与类型

家庭教育参与的主体是家长。“教育参与”这个概念表示父母为了促进孩子教育成就的多种行为,涵盖了对学生的教育计划和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期望,

收稿日期:2019-02-27

作者简介:范云霞(1991—),女,安徽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研究,E-mail:fanyunxia0912005@163.com;郑新蓉(1957—),女,四川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社会学、农村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高考陪读现象下劳动家庭的教育卷入研究”(项目编号:20YJC880012),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目“普职分流背景下的劳动家庭的教育卷入研究”(项目编号:19JYXK024)研究成果。

以及父母在家和在校为促进学生学习的多种行动。^[13] 广义上,家庭的教育参与是指父母为实现子女的教育成果和未来的成功所做的关于学校和学生的工。作。^[14-15] 具体而言,则包括:(1)在家参与(Home-based involvement):家长在家庭中实施和加强校本学习,包括监测作业完成、检查作业和教育充实活动;(2)在校参与(School-based involvement):家长积极参与学校活动,例如参加学校组织,在学校做义工,在家长—教师会议或其他校园活动中与教师沟通;(3)学术社会化(Academic socialization):包括关于学校的间接信息,比如家长传达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看法和更具体的讨论、家长直接促进儿童未来发展的教育和职业计划。学术社会化允许父母为孩子提供独立和教育成功所需的工具。^[16-17] 国内关于教育参与的研究把教育参与分为四类:(1)校内参与,如免费义务教育让家庭在校内参与上平等性得到加强;(2)校外参与,如补习班、家教、兴趣班;(3)择校参与,如选择学区房以获得特定学校的入学资格;(4)对子女教育的时间投入。^[18]¹⁻² 关于家庭教育参与的研究往往关注家长对学生学业的直接支持,但是按照这种既有用法,“高考陪读”并不像家庭教育参与方面的研究所关注的家长对子女学业或教育具有显性作用,而是以“照料”的方式间接参与子女教育。

(二)教育分流与家庭教育参与的研究

对于家庭而言,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会影响到社会地位的获得,高等教育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上流动的重要途径。^[19-20] 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与教育机会获得关系上存在两种理论假设模型:第一种是拉夫特里(Raftery)和胡特(Hout)提出的“最大化维持不平等”(MMI)的假说,认为教育机会的分配是较高阶层的家庭教育需求达到完全饱和后,才会分配到下一阶层。^[21] 中国学者如郝大海和吴愈晓、吴晓刚也验证了 MMI 假说,即在较低的教育阶段(小学、初中),优势家庭教育需求达到完全饱和后,扩招有利于减少教育不平等,但在更高的教育阶段(高中、大学),扩招使教育不平等得以维持甚至有所扩大。^[22-23] Lucas 拓展性地提出了的“有效维持不平等”(EMI)假说,即数量均衡不足以消除不平等,因为所获得的教育类型与质量的不平等可以有效地再生产家庭社会经济不平等。^[24-25]^[18]¹⁶⁻¹⁷ MMI 假说强调的是教育机会的分配,对于 EMI 假说来说,这种

教育机会分配需要从教育年限(量的维度)与教育质量(质的维度)考虑。例如张义祯验证了在高校扩招后,中国社会成员教育获得在数量上的不平等逐步下降,但在质量上的不平等却始终有效维持。^[26]

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处于社会经济劣势的劳动家庭一方面拥有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这是教育机会扩张带来的结果;另一方面,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仍难以获得。由此形成家庭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的增大与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

(三)性别与家长教育参与

伴随着教育竞争的加剧,家长卷入子女的学校教育过程成为必要。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家长(母亲)表达了更强烈的意愿并付出更多的精力。关于家庭教育参与的质性研究发现,女性家长会在教育上花费更多精力与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发现母亲将子女教育作为建构其母职的重要义务。^[27-29] 不同阶层母亲在教育参与的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3]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与种族,教育参与的阶层差异解释力并没有那么强。这类研究发现,工人阶层母亲同样拥有协作培养的愿景,并在工作与养育子女之间不断挣扎。^[30] 近年来,中国关于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家长教育参与的研究展现出中产阶级女性家长“协作培养”与“教育经纪化”,日益强调家庭教育的专业化,女性家长以“教育家”的姿态投入孩子的教养。^{[3][29]} 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思考中国工农阶层女性家长的教育参与实践及其行动逻辑。

二、劳动家庭的教育参与： 以 M 镇“高考陪读”现象为例

本研究聚焦 M 镇——位于中国中部经济带的安徽省西北部。M 镇之所以能够成为典型的陪读群落,是因为这里有被称为“高考工厂”的学校——M 中学及其民办学校 J 中学。让 M 中学闻名于世的就是建于 J 中学校内的高考补习中心,高考落榜生通过一年的补习再参加高考。M 中学、J 中学及其补习中心以每年高考高本科录取率而吸引了周边地区生源。由于高强度的学习需要学生最大限度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进而以照料学生使得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家长陪读现象相应而生。本研究在 M 镇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田野研究,根据田野研究的质

性资料与抽样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对劳动家庭的高考陪读现象进行分析。

根据2018年9月份M中学与J中学(及其高考补习中心)关于学生住宿情况登记表统计,当时M镇陪读的高中男生为14701人,占总学生数的64.78%。其中家长陪读为14213人,托管机构代陪读为488人。在2018年9月的抽样问卷调查^①中,关于高考陪读家长调研的问卷结果显示,陪读家长群体构成以农村女性家长为主(占女性家长总数71%),其中母亲为陪读家长的主力(占总陪读家长67.85%)。这些陪读家庭年收入集中在1~5万元区间与6~10万元区间,陪读家长在陪读前主要从事自由职业、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职业,且多为低收入甚至无工作的女性。总体而言,陪读母亲及家庭属于社会中低阶层,以农村户籍的陪读母亲为主,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是以“自食其力”的劳动为谋生手段的劳动阶层女性家长。高考陪读现象表明,中国劳动阶层家庭即使在教育投入金钱的绝对值上不敌中产家庭,但是却以“陪读”这种特殊方式支持子女学业成功付出巨大努力。

(一) 高考陪读的日常劳动

家务劳动是陪读劳动的主要类型,根据抽样问卷统计,这些家务劳动每天平均花费约3小时。如果家长要送饭,那么就另外还需要1~2小时。在实际观察与访谈中,家长的陪读劳动更加琐碎、繁复与长时间。^②

早上5:30要开始烧早饭,煮点面条、煮汤饭。挺快的,不麻烦。快6:00把他喊起来洗脸刷牙。一番吃完就要去班里,他们班主任每天早上要到班里看着,看有没有学生迟到。他吃完就要去班里,6:20必须要到。(家长F12)

每天早上,家长需要在6:00之前起床并准备好早饭,因为学生将在6:20上学。等到学生开始其一天的学校教育生活时,家长则在家中从事照料学生的家务活动:收拾并洗好碗碟、打扫房间、洗衣服、买菜以及准备午餐。中午和傍晚放学就餐时间里,为了给孩子节约时间,送饭的家长陆陆续续蹲守在学

校门口。

他现在高四(高考补习生),学习时间紧。我在这陪读本来就是专门照顾他吃喝的,每天的任务就是做吃的然后给他送来。他中午抓紧吃饭,吃完饭还要再午睡一会。下午抓紧时间学习。孩子哪有时间回家。回家路上一来一去就要二十多分钟,饭还吃不成呢。(家长F25)

傍晚时分,家长会走出出租屋,享受休闲时光:跳广场舞、散步、爬山等。20:30左右,家长们就陆续回家了。回家并不能马上入睡,因为要等孩子22:30(高三和复读生22:50)放学回家,还有家长担心孩子安全会赶去校门口接孩子回家。孩子回家,家长会准备简单的宵夜,有时候要陪着写作业而不能立马入睡。大约要忙到零点以后才能睡觉。

晚上(跳完舞)回家洗洗搞搞都要到九十点钟,然后还要等我儿子回来,有时候还要给他搞点宵夜吃,一般不到十二点多钟都不能睡。(家长F22)

日常劳作是琐碎、庸常与重复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平淡而单调。在重复的陪读劳动、休闲与交往中,作为个体的陪读家长再生产其“陪读家长”的身份,并形成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期望。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并不是通过语言直接表达出来,而是嵌入在日常生活之中:为孩子洗衣铺床,为孩子营养精心准备食品,与同伴交流各自孩子的学习状态等。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之中,陪读的意义嵌入其中。

(二) 服侍:女性家长陪读劳动的特征

陪读是需要大量精力、时间与人力投入的过程,并且陪读劳动主要由家务劳动构成,女性家长成为陪读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在访谈过程中,家长表达自己陪读劳动往往使用“照顾”“照料”与“服侍”这类动词。“服侍”一词鲜明地表现出家长对于孩子的态度,是以孩子为中心,并且全力负责孩子的生活琐事。家长往往会说:“过来服侍孩子”“不来服侍不照”(“照”为当地方言,表示“可以,行”)“孩子要有人服侍”等。类似于此的表达还有“保姆”“后勤”这样的对自身陪读角色的定位。因此可以发现,陪读作为一种教育参与方式其实并不是以家长权威为基础

^① 问卷调查设计了家长陪读情况调查问卷和学生陪读情况调查问卷。前者主要针对家长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以及陪读状态和感受进行调查,后者则与之对应调查学生被陪读的心理状态与对教育的态度等。在M中学与J中学高一至高三以及补习中心共发放家长问卷共500份,学生问卷共500份,回收家长有效问卷406份,学生有效问卷451份。

^② 除了全职陪读的家长以外,还有一边工作一边陪读的家长,M镇大大小小的制衣厂是主要的兼职渠道。家长有效问卷样本量406中,有71位家长填写兼职时间,在做兼职工作的家长中,每天工作8小时及其以上的占约34%。

进行精致儿童塑造的过程,而是家长放弃权威角色,以低姿态的服务者形象照料孩子,从而让孩子投入到完全的学习者角色之中。

她们没有时间的,她们就星期日下午有三个小时,女孩子换换衣服、洗洗澡,买点小东西,然后就要回去考试。她们天天上课,没有时间的……时间好忙。一开始在学校她们不行,早上从来不吃早饭,没有时间嘛,晚上晚自习都要上到11:00……她们在学校早饭没有时间吃,从来不吃早饭,可怜死了,没人来服侍怎么办呢。(家长F3)

我们就是搞后勤,她只要把学习搞好,其他事情我们家长来弄,她学习苦,我们就提供好的学习环境和物质基础。(家长F18)

不同阶层的家庭在面对教育竞争的态度与所能运用的资源是不同的。中产阶层家长在教育参与中通常会以管理者与教育家的身份参与到教育事务之中,或者通过购买教育劳动和教育服务助力子女教育,例如报辅导班、请家教、参加夏令营等。劳动阶层家长教育资源的匮乏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劳动阶层家庭在子女教育投入精力不足,甚至被学校抱怨“不配合学校”。然而,陪读劳动却反映出劳动家庭女性家长牺牲工作,在子女教育上特殊的教育投入。即,母亲通过家务劳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子女在非学习任务上的时间,并通过食品营养、安静的睡眠与学习环境让子女更好地投入学习之中。学生既是陪读劳动直接的对象,又是教育劳动的承担者,学生通过将大量精力、时间投入学习中从而获得更高的高考成绩。同时,学校将对学生生活照料的责任转移到家庭,使得学校将教师精力主要集中在教学任务上。由此形成高强度的以提升成绩为目标的教育劳动的分工模式。

陪读家长代替子女进行的洗衣、做饭等劳动,在价值序列上,这些事务并不重要,甚至是对学生学习时间的浪费,学生不应被要求承担这些生活劳动。因此,这种教育劳动分工逻辑隐含了教育劳动的等级秩序,提高成绩的教育教学工作以及掌握知识与应试技巧的学习是最重要的劳动,其他劳动都要让位于此。家长就像承接低端工业生产环节那样承担了家务与生活照料的劳动,成为整个服务于高考竞赛的教育劳动的低端劳动分工。

(三)教育劳动分工中的风险与认同危机

与教师教育劳动有明确绩效考核指标不同,家长的教育劳动往往是难以被考核的。这意味着陪读

家长的付出常常不能得到及时回报与反馈。作为一种劳动分工,陪读的任务是保障孩子全力投入学习以获得学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陪读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孩子的学业,并且由于学生的学业进步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学生成绩进步与否并不是家长的付出所能决定的。

1. 成绩提不上去:陪读劳动面临的风险

家长对学生学习进步的归因往往是:孩子愿意主动学习了,或者是学校高强度的学习促进了成绩进步。然而一旦成绩下降,成功归因失去解释效力,家长则感到不知所措。

李春(编号F3)是位尽心尽责的陪读家长,终日忙碌着“服侍”两个侄女。一次,李春遇到了一个难题,她告诉我,李小双最近成绩一直没有提升,这让她非常担心与焦虑。

不行,考得差,哎,就考了400多分。小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好像学习没有方法样的,找不到方法。他(班主任)讲她学习态度还好哎。我去的,那次叫家长去签字嘛,我就问他,小小这段时间学习怎么样?他讲学习态度还好哎。你讲怎么办?她学习态度还好不行啊,学习成绩没有进步哎……找不到方法,学习学不上去,成绩提不来。每周周考看不到她的单子,她肯定考得不好哎,不然怎么不让我看到单子呢……我讲你放假时间要去补课哎,该补的要补哎,她还不肯补。讲叫她补,她不肯补,就等于放弃一样。怎么搞呢?搞死人了!不管怎么讲我花一切代价,我真想你考上去。(停顿,沉默)(家长F3)

像李春这样全身心投入陪读之中,却无法看见孩子学习进步的家长并不在少数。对于家长而言,最烦恼的就是孩子学习成绩无法得到提高甚至退步。以高考竞争为终点的教育吞噬了家庭生活,在这种选拔教育之中,学生要付出极大的精力与时间,家长同样卷入其中。但是这种卷入存在成绩提升的不确定性,越是如此,家长越是深陷其中。

2. 无聊:爱的囚徒困境

照料,作为一种家庭内部的教育行动是具有情感、伦理面向的,陪读被家长视其为爱与责任的表达,同时,照料子女是一种无偿劳动,在劳动力市场没有更大机会的女性成为这种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它是一种非专业的、低端而无偿的边缘的教育参与,相对于教师的教育劳动以及中产家庭家长的教育劳动,陪读家长在教育中的姿态是低位的。母亲的角色与爱的名义包裹着陪读劳动,使得这项劳动的无

偿性、强制性与机械性被忽视。

父母对子女的自然之爱是家长陪读的心理支撑,但是这种爱却以自我意义感消解为代价。“无聊”成为一些家长向我抱怨陪读生活的主要词汇。临近高考,一些高三和复读生的家长则会感叹:

快解放了,我现在都一天天数着日子过,在这里太无聊了。(家长 F48)

太无聊了,我觉得比我上班还累……这样不行的,这样真失去自我了。不是说你陪孩子怎么着,到这里我们都失去自我了,没有价值了,到四十多岁,打工都没人要了。(家长 F5)

陪读需要家长将自我建立在子女与学校教育成果之上,父母的劳动是为了子女,为了让子女更好投入到高强度学习劳动中,由此形成高强度的教育生产。在这一过程中,“陪读家长”身份凌驾于母亲的其他社会身份之上,自我的意义感建立在陪读劳动基础上。当亲子之间的自然之爱遭遇教育生产对“爱”的要求,父母以爱之名参与教育劳动分工,支撑着孩子的高强度学习,进而客观上维持高考教育生产秩序。爱的相互关系化作单向度的劳动付出,最终以子女获得教育成就为爱的成果。亲子之爱被教育竞争裹挟,母亲将自我的社会价值投入到孩子的教育生产之中。

三、劳动换知识:劳动家庭向上流动的机制和动力

陪读群落化是近十年来兴起的新现象,它的产生虽然有多种源头,但是教育机制是重要的生长土壤。在这样高竞争状态的教育系统中,家庭面临高考这一关键的选拔考试,其紧要地位高于其他家庭和社会事务,家长选择全力投入到对孩子高考的支持中。这里,先从教育运作机制入手,进而再考虑劳动家庭遭遇的社会境遇与家长的行动策略。

(一)教育竞争:强筛选锦标赛流动机制

虽然,有很多研究关注的是教育究竟促进了社会流动还是阻碍了社会流动,如拉尔夫·H·特纳(Turner R. H.)坦言,界定向上流动模式的大众标

准是形塑学校教育系统的因素,它比向上流动的程度更为关键。特纳区分了两种教育系统的流动模型:保荐型流动(sponsor mobility)与竞赛型流动(contest mobility)。例如,欧洲英国、法国等国家多为保荐型流动,即新的精英招募者由现有精英或他们的代理人选择,精英地位根据既定的价值标准,不能通过任何努力或策略获得。美国的学校教育系统则被认为是竞赛型流动,即以精英地位为奖品,由立志者自己努力获得的制度。虽然“竞赛”是由一些公平竞争的规则来管理的,但参赛者在他们可能采用的策略上有很大的自由度。^[31]除此以外,罗森鲍姆(Rosenbaum J. E.)提出第三种模型:锦标赛流动(tournament mobility),锦标赛流动虽然竞争性很强但不同于竞赛型流动,在锦标赛流动的系统中,只有每一阶段的胜利者才能进入下一场比赛;失败者将退出比赛。^[32-33]罗森鲍姆对教育系统内的学生流动模式的分析拓展了后来学者对于东亚教育系统的分析路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国家如日本、中国,不同于欧洲保荐型、美国竞赛型流动,更像是锦标赛型流动。^[33-35]^①

教育竞争从初中到高中的过渡是第一轮,从高中到大学的过渡是第二轮,比赛模式是在第一轮中未被选中个人将被淘汰或取消参加第二轮比赛的资格。为了竞争进入大学(非职业院校),学生必须进入普通高中。对于中国学生而言,进入高中只是获得下一轮比赛的资格。最为重要的是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方面,中国作为“赶超发展”的后发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上采取“非均衡型发展”模式,国家集中财政力量优先发展少数研究型大学(例如“985”、“211”工程以及双一流大学建设),与此同时,借助地方政府与市场资源发展大众型大学。^[36-37]在这种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下,中国高等院校呈现层级化。这就意味着在高考中取得成功的少数学生不仅能进入文凭价值、教育质量俱佳的大学,而且家庭所负担的学费压力也较少;反之,在高考中进入层级较低的高等院校的学生则接受教育质量较差的高等教育,并且所获得的

^① 有学者翻译为“淘汰赛流动”,但是淘汰赛实际上对应的英文是 knockout 或 elimination game,意思是按预定的顺序进行比赛,负方淘汰,胜者继续比赛,直至产生出冠军。它与锦标赛不同,锦标赛(tournament)的赛制是指不同地区或竞赛大组的优胜者之间的比赛,是经历反复比赛从而选出极少数胜利者。而且用体育比赛形容这种学校教育系统,那么遵循已有的关于 tournament 的翻译用法可能更合适。中国学者的翻译用词和相关论证可参见:侯利明:《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载《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第192-213页。

文凭价值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这种“零和博弈”的锦标赛流动模式的教育系统加剧了学生参加高考的巨大压力。

高考设计初衷是为了提供一个公平的选拔考试,高考保障每个参与这场比赛的选手都处于公平的程序之中。然而这种程序正义的设计却不得不面临参加高考的学生差异化的社会背景,以及录取学生数额政策的区域差异设计。因此虽然高考提供了一种程序正义的比赛,但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因素影响,以及录取名额分配的区域不均等,在这场程序正义的比赛中,一旦拨开“无知之幕”^{[38]14-17,105-116}①不公平的原初状态就无法维系程序正义的公平性。

我们安徽高考分数真是高,像我表弟他家儿子在福建上学,他去年510分还是520分,他是理科,他进了福州科技大学。他上的是一本哎。你像在湖北那边,我同学在湖北大学那儿当大学教授,他(她)说去年400零几分就是一本线。我说我们是440分文科才是二本线。他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分多少名额到那个省,从高往下排,排到哪里,他一本线就在哪里。内蒙古的也好低,我家孩子班上有个同学是内蒙古的,内蒙古分数也好低哎。就我们安徽分数要求高嘛,没法子啊,你不念他念啊,你能怎么搞。(家长F9)

正如家长所言,在关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存在地区不平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上,有研究者关注到中国高考录取率的地域差距问题。高等教育扩招一方面整体上扩大了各地区考生的高等院校教育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存在东部与中西部的分化^[39-40];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经济发达且优质高校聚集之地占据绝对优势^[41]。除了经济与教育资源本身的优势以外,高考分数线倾斜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不均衡的重要因素。^[42]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不均衡意味着中部省域高考竞争激烈,高等教育金字塔分层化则意味着高考竞争具有强激励性。这种竞争的激烈性与激励性影响了家庭的教育抉择,对于需要通过高考实现孩子向上流动的家庭,全力投入高考成为最优抉择。

(二)“儿女心”: 社会现代化中的新家庭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以区域性崛起

为特征,形成以京津区域、长三角区域与珠三角区域为核心的人口辐合流场。与之相应的是,在这些区域地理位置相近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则成为人口辐合流场。位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安徽省的经济受到长三角影响大,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经济发展吸引安徽省人口流出。安徽省是典型的人口流出省,根据2016年各省市人口净流入数据统计,安徽省净流出人口(人口总流出量减去人口总流入量的差)为-30 117人,在人口流出量排名位居首位。^[43]其相邻地区,如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这些经济发达区域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工作平台都强烈吸引着安徽省人口迁移。陪读的劳动家庭多为省内迁移或跨省迁移的务工或经商的家庭,这类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工作为目的迁移到经济发达地区的家长群体(户籍受限)自身的人生就经历了从传统的、稳固的社会集团转变为流动的、不稳定的、直面社会不平等的生涯。

中国劳动家庭的社会向上流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作场域的流动,从农村流向城市;第二阶段则是社会身份的流动,通过教育机制使得子代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并从事社会身份地位更高的脑力劳动。自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农民通过在城市做生意、打工获得金钱,同时,城市的经历也为他们带来对传统乡土生活的排斥。通过入城打工与做生意,他们快速获得金钱,学校教育被视为无用的,读书无用论曾一度喧嚣尘上。^{[44]91-95}但是短短20年,仅凭奋斗已经无法赶上知识经济的脚步,陪读家长这代人经受了“没文化”的苦头。

以前像农村种地也不值钱,小时候也穷得很,没上过学。现在哪个有学问了,到公司拿工资、买房子也不错。像我们打工,捡个破烂累死人。累、累,你到哪干活不累个死,人家肯给你钱?钱难挣得很,你像我们都四五十岁了,人家嫌年龄大都不要,都要技术工。你这有学问的,有文凭牌子挂着,到哪地方给人算个账都好一点的。(家长F51)

这种流动性使得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阶层在现代社会中抗风险能力较弱,也意味着劳动阶层的生存风险更大。同时,也造成一种更加相信个

① 罗尔斯曾经做过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为了实现公平的正义,首先需要有一个平等的原始状态,这个原始状态中没有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天赋、能力、价值偏好等,这是一种无知之幕。任何人在选择在争议的原则时不会因为先天因素或后天的社会背景而得益或受害,从而设计出一种不受个人喜恶、利益、偏见影响的正义原则。

人努力、脱离乡土与进取的文化。中国这一代劳动群体,他们一方面从事着低收入、没有保障的体力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感受到离开乡土带来的机遇与全新的生活经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教育脱离他们的社会命运。以孩子为中心的新家庭主义支撑了这种希望。

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家庭观发生着变化,阎云翔、郭于华、康岚等人将当前中国青年一代对家庭主义的认同以家庭的价值取向与个人的权利取向为双重特征的家庭价值观称为“新家庭主义”^[45]。新家庭主义在本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是家庭中子女利益高于父母利益,父母为实现子女社会地位上升与生活福利而奉献自己。父母对这种单向度付出是认同的,并以此建构家长身份。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独生子女时代的“少子化”让现代核心家庭的父母对珍稀的孩子尤为爱护。^{[46]xiir-xvi}一位家长用“儿女心”形容陪读家长对子女的不舍与依恋:

现在家长儿女心重,像我们小时候,父母生四五个小孩都是正常的,现在家里就一个小孩,要么就是两个,小孩更宝贵了。我们年轻时候,就要靠自己出来赚钱,不从家里独立出来不照。现在一个是小孩从小娇生惯养,什么事都不会干,家长就依着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现在家长儿女心重,要是离开小孩他自己就受不了了。(家长 M54)

以“儿女心”为表征的新家庭主义表现为家庭以子女为中心,家长将为子女个体幸福的付出视为家长的责任。劳动阶层的家长不是将子女视为现成的家庭劳动力,希望子女投入工作增加家庭收入;相反,劳动阶层家长通过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希望子女离开原生家庭实现代际向上流动。

(三)投入“应试教育”:以“苦学”逃离“苦活”

在强竞争激励的“锦标赛式”流动的教育系统与以“儿女心”为表征的新家庭主义影响下,劳动家庭家长以“陪读”这种方式支持学生通过“苦学”获得成绩提升,以期逃离他们这辈“苦活”的命运。在以“减负”和“素质教育”为主流话语的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过程中,学校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间,但是课程学习的内容并没有压缩,基础教育联接高等教育的桥梁——高考,仍然是大部分学生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关卡。作为缺乏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的劳动家庭和家

长,并不能像中产阶层家长那样通过精致化教养参与到素质教育,但是,他们却全面投入“应试教育”,以其坚韧的“低端”劳动改善中低阶层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上的劣势。

这学校抓得严,小孩在家里就玩电脑、看手机,它这抓得严,小孩没有网吧上网,学生都在学习,他看到人家在学他也要学……他初中时候成绩挺好的,然后考上一中。高中成绩就不行了。他们老师不怎么管他们学习,没有这边老师负责。小孩不自觉,你不管他他就玩手机。然后我讲高考就这一次机会了,你要再不行就没有机会了。(家长 F24)

家长以一种传统的身体劳作投入的方式让子女通过知识编码转换而获得现代性。以一种传统家务劳动支撑子女考入更好的高等院校而获得个体的劳动自由选择权。这其中,女性成为陪读劳动的主体。劳动家庭以女性深层的劳动卷入换取子代的脱离父母辈劳动命运。面对社会的不平等、现代的风险性与庞杂的知识权力巨塔,劳动家庭并没有安于现状。他们用一种近乎本能与劳动的方式参与残酷的教育竞争,他们用子代离开自己的生活世界为代价实现子代的向上流动。

参考文献:

- [1] STANDING K. Lone Mothers' Unpaid Schoolwork as a Household Issue[A]. Gender Perspectives on Household Issues Conference[C]. University of Reading, 1995: 8-9.
- [2] 安妮特·拉鲁. 不平等的童年[M]. 张旭,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3] 安妮特·拉鲁. 家庭优势:社会阶层与家长参与[M]. 吴重涵,熊苏春,张俊,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
- [4] 金一虹,杨笛. 教育“拼妈”:“家长主义”的盛行与母职再造[J]. 南京社会科学, 2015(2): 61-67.
- [5] 肖索未. “严母慈祖”:儿童抚育中的代际合作与权力关系[J]. 社会学研究, 2014, 29(6): 148-171, 244-245.
- [6] 薛海平. 从学校教育到影子教育:教育竞争与社会再生产[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47-69, 188-189.
- [7] HAMILTON L, WERUM R, STEELMAN L C, et al. Changing Family, Changing Education [A]// HALLINAN M A. Frontiers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Springer Netherlands, 2011: 205-223.
- [8] SEWELL W H, HAUSER R M.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Earnings: Achievement in the Early Career [M].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75.
- [9] CLARK R M. Family Life and School Achievement: Why Poor Black Children Succeed or Fail [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10] 王平. 城市中家庭背景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11] STEELMAN L C, POWELL B. Sponso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Parental Willingness to Pay For Higher Educa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6 (6): 1505-1529.
- [12] HORVAT E M N, WEININGER E B, LAREAU A. From Social Ties to Social Capit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 Networks [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03, 40 (2): 319-351.
- [13] SEGNER R. Parents' Educational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Ecology Perspective [J].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2006, 6(1): 1-48.
- [14] HILL N E, CASTELLINO D R, LANSFORD J E, et al. Parent Academic Involvement as Related to School Behavior, Achievement, and Aspirations: Demographic Variations Across Adolescence [J]. *Child development*, 2004, 75(5): 1491-1509.
- [15] SIMON B S, EPSTEIN J L. School,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nerships [J]. Promising practices for family involvement in schools. Greenwich, Conn.: Information Age Publication, 2001: 1-84.
- [16] VOORHIS F L V. Costs and Benefits of Family Involvement in Homework [J]. *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s*, 2011, 22(2): 220-249.
- [17] BENNER A D, BOYLE A E, SADLER S. Parental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s' Educational Success: The Roles of Prior Achieve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J].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2016, 45(6): 1053-1064.
- [18] 迟巍, 吴斌珍, 钱晓焯, 等. 我国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研究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 [19] COLLINS R. Functional and Conflict Theories of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1, 1002-1019.
- [20] 潘懋元. 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260.
- [21] 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75 [J].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 41-62.
- [22] 郝大海. 中国城市教育分层研究(1949—2003)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6): 94-107, 206.
- [23] 吴愈晓, 吴晓刚. 城镇的职业性别隔离与收入分层 [J]. *社会学研究*, 2009(4): 88-111, 244.
- [24] 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 106 (6): 1642-1690.
- [25] LUCAS S R, BYRNE D.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J].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17, 61(1): 3-7.
- [26] 张义祯. 教育获得与教育流动实证研究——基于代际视角 [D]. 上海: 上海大学, 2016.
- [27] CHRISTOPHER K. Extensive Mothering: Employed Mothers' Constructions of the Good Mother [J]. *Gender & Society*, 2012, 26(1): 73-96.
- [28] 邹盛奇, 伍新春, 刘畅. 母亲守门员效应——概念结构、理论解释与研究展望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6): 41-49.
- [29] 杨可. 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2): 79-90.
- [30] EINAT L, ORLY B. Working-class Mothers' School Involvement: a Class-specific Maternal Ideal? [J].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 63(3): 608-625.
- [31] TURNER R H. Sponsored and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School Syste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60, 25(6): 855-867.
- [32] ROSENBAUM J E. Tournament Mobility: Career Patterns in a Corporation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9, 24(2): 220-241.
- [33] ROSENBAUM J E. Making Inequality: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High School Tracking [J].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76: 183-198.
- [34] ONO H. Who Goes to College?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Tracking in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 [J].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2001, 109(2): 161-195.
- [35] 侯利明. 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 [J]. *社会学研究*, 2015, 2(2): 192-213.
- [36] 孙伦轩, 陈·巴特尔. 分层与断裂: “金砖四国”高等教育的结构风险初探 [J]. *江苏高教*, 2017(5): 99-103.
- [37] 俞蓁. 陡峭与平缓: 高等教育体系分层结构差异及其嬗变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5, 36(5): 20-28.
- [38] 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 [M]. 何怀宏, 何包钢, 廖申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39] 曹妍, 张瑞娟. 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及其地区差异: 2007-2015年 [J]. *教育发展研究*, 2017, 37(1): 25-35.
- [40] 刘精明. 扩招时期高等教育机会的地区差异研究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4): 142-155.
- [41] 乔锦忠. 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布的区域差异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1): 23-28.
- [42] 李立峰. 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演变及成因探析——兼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分配 [J]. *北京大学教育评*

- 论,2010,8(2):56-70,188-189.
- [43] 2011—2016 各省市人口流入流出数据[EB/OL]. <http://www.chinaldrk.org.cn/wjw/#/data/classify/visualization>.
- [44] 瑞雪·墨菲.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 黄涛,王静,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 [45] 康岚. 代差与代同:新家庭主义价值的兴起[J]. 青年研究,2012(3):21-29,94.
- [46] 景军.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M]. 钱霖亮,李胜,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Study Companion For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Working-class Families'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FAN Yun-xia¹, ZHENG Xin-rong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the education competition is becoming fiercer and fiercer in today's society, families of different classes are inevitably involved in it. Relevant studies considering middle-class families'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 show that female parents are dedicated to refined upbringing and support their child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 with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It is traditionally believed that working-class familie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disadvantage of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de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study companion for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China's county-level cities and towns displays that female parents of working-class families participate in education through "physical" input and "service" care-oriented labor. Parents who take part in study companion inevitably fall into the risk of children's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recognition crisis of "maternal love", which is the collective result of China's strong contest mobility and the new families occurring by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 working-class families try to make their children concentrate their energy and time on "hard study" by accompanying them in study, thus avoiding their children from repeating their "hard work" fate.

Key words: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motherhood; study companion for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division of labour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competition

(责任编辑 李 涛)